

FLH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国际文学理论学会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主编：王宁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18



文学理论前沿

(第十八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18

主编：王宁



文学
理论
前沿

(第十八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前沿. 第十八辑 / 王宁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9758-5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7252 号

责任编辑：曹诗悦

封面设计：覃一彪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4 **字 数：**267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

定 价：58.00 元

产品编号：076731-01

国际顾问委员会

乔纳森·卡勒	特里·伊格尔顿	胡经之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陆贵山	J. 希利斯·米勒	W. J. T. 米切尔	钱中文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吴元迈		

主编

王 宁

副主编

徐 剑 生安锋

编 委

霍米·巴巴	马歇尔·布朗	曹顺庆	陈永国
戴维·戴姆拉什	党圣元	金元浦	刘 康
罗 钢	陶东风	王一川	王岳川
谢少波	许 明	周 宪	朱立元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Jonathan Culler	Terry Eagleton	Hu Jingzhi	Fredric Jameson
Lu Guishan	J. Hillis Miller	W. J. T. Mitchell	Qian Zhongwen
Gayatri Spivak	Wu Yuanmai		

EDITOR

Wang Ning

ASSOCIATE EDITORS

Xu Jian Sheng Anfeng

EDITORIAL BOARD

Homi Bhabha	Marshall Brown	Cao Shunqing	Chen Yongguo
David Damrosch	Dang Shengyuan	Jin Yuanpu	Liu Kang
Luo Gang	Tao Dongfeng	Wang Yichuan	Wang Yuechuan
Xie Shaobo	Xu Ming	Zhou Xian	Zhu Liyuan

编者前言

经过数月时间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十八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集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开始几年一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几年来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丛刊实际上又担当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自2009年起，由于本刊主编王宁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聘为讲席教授，因而本刊将由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强强联合吧。值得欣慰的是，本刊自创刊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增大，而且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可以说，本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集刊已连续四度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来源集刊，前几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又对各种集刊进行了整顿，一些集刊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办，而本刊则得以幸存，而且自2014年起改为半年刊。这些无疑对本刊是极大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还要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有两个：一是站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推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所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于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长篇论文的大型集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本刊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现每年出版两辑，也许今后会出版三辑或四辑。与国内所有集刊或期刊不同的是，本刊专门刊发20 000～30 000字的、既体现扎实

的理论功力同时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 10 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一般不超过 40 000 字。所以对于广大作者的热心投稿，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在仔细研究本刊的办刊方针和研读各辑所发论文之后再寄来稿件。本刊每一辑发表境外学者论文 1~2 篇，视其是否与该辑主题相符，这些论文一般选译自国际文学理论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主编拥有这两家刊物的中文版权）或直接向境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刊用。现在每一辑的字数为 200 000 字左右。

读者也许已经看到，本辑与第十七辑的栏目设置略有不同。第一个栏目依然是过去沿袭下来的主打栏目《前沿理论思潮探讨》。这一栏目的第一篇文章出自本刊国际编委马歇尔·布朗之手，他的这篇专稿曾在中国一些高校作过演讲，后经本刊主编邀请对之作了扩充和修改。该文梳理了英语学界和批评理论界在过去 30 多年来发表的关于理论、反理论及后理论方面的著述，回应了当前关于后理论现象的讨论，认为所有这些试图阻止理论发展的企图都是徒劳的，理论依然存在于当今时代，并且不断地激活我们的批评话语的建构。在当前中国的人文学者强调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背景下，本文的发表将对我们的理论建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分别对当前的理论争鸣和建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陈昕的文章对近现代以来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作了批评性回顾。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内在于西方人文主义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遭到资本逻辑的裹挟，人类不加节制地开发自然，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大规模的海外拓殖，西方人文主义中逐渐滋生出了种族主义。对此，他聚焦纳丁·戈迪默的创作和理论批评，认为她立足于南非并汲取了传统西方人文主义中的积极因素，通过其对抗性书写及政治实践，宣扬超越种族的普遍性自由、平等与公正，在南非力倡一种“后殖民人文主义”，以便促成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构性转换。无疑，在当下提出“后殖民人文主义”的构想会引起国内学界的讨论兴趣。江玉琴的文章与之也有着某种呼应，作者讨论了西方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范式，认为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批评，后殖民生态批评呈现出三种批评范式，分别为政治范式、伦理范式和文化范式。作者认为，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理论，后殖民生态批评建构了面向新的类型的文学作品的理论新视角。鉴于当今的世界文学创作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关涉这一现象，后殖民生态批评范式将为世界文学的文本解读提供新的方法论和阐释视角。应该承认，后殖民生态批评在中国刚刚处于

介绍性的起步阶段，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文章参与讨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虽然进入中国已经多年，但发展依然缓慢，张浩的文章有意在这方面进行推进。她指出，对性别差异、身份建构和女性话语等诸多性别问题的观照，使得精神分析批评成为女性主义批评重要的思想资源。一方面，精神分析批评因浓厚的男性中心主义、父权制和性别歧视色彩而不断受到女性主义者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批评又通过对性压迫的深层精神与语言结构的演示，为女性主义者颠覆“男性中心秩序”提供了理论突破口。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与精神分析批评之间有着一种借鉴与批判的互动关系，应该为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带来一种新的活力。

本辑的第二个栏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选发了两篇论文，分别研究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这两篇文章均是作者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何卫华的文章研究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作者首先指出，世界文学为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滋养，为他们的理论阐发提供了灵感或立论依据。通过对巴尔扎克等的阅读，卢卡奇形成了自己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通过阅读波德莱尔等，本雅明成就了自己的救赎美学；通过阅读鲁迅等，詹姆逊阐明了自己的第三世界文学观。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并没有致力于世界文学理论本身的建设，但他们留下的大量关于世界文学经典文本的评论，对世界文学的选编、流通和理论话语的建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人数众多，涉及世界文学研究者依然有限，因此何卫华的文章聚焦三位代表性人物，着重梳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所作出的理论建树。韩静帆的文章则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作者指出，俄苏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非常重视文学艺术的发展，不仅熟读俄国经典作家的文学作品，对欧美作家的创作及其成就也非常关注。他除了引用作家的思想主张和经典人物形象来论证自己的革命理论，还针对当时的文艺现象、作家的创作特色进行了专门的文学批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文学发展中的问题。列宁充分肯定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的伟大成就，喜爱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对现代主义以及其他文学现象也进行了富有理论洞见的点评。毫无疑问，列宁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世界文学研究仍有着某种指导意义。

本刊第三个栏目为《批评与阐释》，专门发表一些从理论的视角对文学文本进行阐释的研究论文。在这一辑中，刘琦榕的文章以英国小说《占有：一部

浪漫传奇》为考察对象，采用结构主义互文性的分析方法来辨别和确认小说中的童话互文本及其特点，详细地分析了《莴苣》和《玻璃棺》这两部童话在小说文本中的改写情况，通过描述和阐释文学文本中的互文性特点，寻找文本之间、文学传统与当代作品间的指涉关系，寻找经由互文性而展现出来的文学性特质。作者认为，这些童话互文本不仅将原文本中预设的文学性内涵植入小说内容中，还在小说文本内部建构起互文空间，从而在不同的文本形成了一种互文和对话关系。刘光瀛和韦清琦的文章聚焦的是莫言作品的素食观，在两位作者看来，在莫言的作品中，“吃”是一个核心概念，他将与“吃”相关的饥饿状态和暴饮暴食现象的描述推向极致，展现了由“吃”所反映的权力压迫体系，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物种关怀、生态忧患意识以及解构压迫等生态伦理精神。文章通过文本细读，并运用生态伦理视野下的素食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批评来展示莫言作品中的食物与压迫主体关系，以及以道德关怀和饮食关怀为目标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莫言的作品作了全新的阐释。叶洛夫的文章涉及文学与宗教，提供了一种圣经文本与电影文本的互文式解读。作者认为，圣经文学批评理论正在向个性化的“读者中心”转变，其特征是批评的形式和理论随着诠释者个人的文化结构和思想背景不同而体现出了多元化特征。他的文章在介绍《但以理书》第七章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把圣经文本和电影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从而有助于理解文本内涵的不同层次。作者认为，这样的比较阅读有益于发掘古老圣经文本的现实意义，并能丰富圣经文学批评理论。本刊虽然这方面收到的来稿较多，但大多数缺乏对文本的理论分析，因而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所以希望今后的投稿者仔细阅读本刊所发论文之后再发来稿件。

本刊的编定正值暑期来临之际，大家都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进行新学期开始的准备工作，我在此谨向为本辑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始终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 宁

2017年8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前沿理论思潮探讨

追踪理论	[美] 马歇尔 · 布朗	1
走向普遍性的“后殖民人文主义”		
——论纳丁 · 戈迪默的对抗性书写与政治实践	陈 昕	24
论西方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范式建构	江玉琴	45
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的三重维度	张 浩	68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	何卫华	85
列宁论世界文学	韩静帆	122

批评与阐释

从互文性视角探讨小说《占有》中童话的改写	刘琦榕	143
食物与压迫主体：莫言作品中的素食生态观	刘光赢 韦清琦	165
圣经文本与电影文本的互文式解读		
——《但以理书》第七章为个案	叶洛夫	189

CONTENTS

Editor's Note

Exploring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Trends

Marshall Brown

- Going after Theory 1

Chen Xin

- Toward a Universal “Postcolonial Humanism” 24

Jiang Yuqin

- On the Paradigm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45

Zhang Hao

-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sychoanalytic Feminist Criticism 68

Studies of Marxism and World Literature

He Weihua

- On Western Marxist Studies of World Literature 85

Han Jingfan

- Vladimir Ilich Lenin on World Literature 122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Liu Qirong

- The Rewriting of Fairy Tales in *Possession*: An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 143

Liu Guangying and Wei Qingqi

- Food and the Oppressive Subjectivity:
The Vegetarian Ecological Idea in Mo Yan’s Works 165

Ye Luofu

- An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the Biblical Text and Film Text:
The Case of *Daniel Chapter 7* 189

追踪理论^[1]

[美国] 马歇尔·布朗

理论的好时光正在殆尽；时间已晚；而理论家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么说。

——斯坦利·费什，《后果》

去“追踪”(go after)一样东西，就是对其跟随、追求，或者指控告发。追踪理论通常从违背理论开始，但从未在此结束。最终“追踪理论”便融合了after一词的三种含义。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措辞来反对理论，并追踪理论。本文回顾了过去的立场与做法，目的不是去试图统一那些不同的、多多少少具有争论性的陈述，而是说明我们已经多少次错失良机。批评家们寻求更好的理论、理论的替代，以及分置理论的资源，但是，正如我将提出的，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我将这些作者非正式地分为四种类型，称之为前理论(ex-theory)、反理论(against theory)、无理论(without theory)、后理论(post-theory)。虽然例子不能证明什么，但是他们确实可以累加起来，并且将指向——在我看来——它们累加的结果，这其中带有的两个历史根源就是浪漫时代的两位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否认或甚至谴责某个理论家的过度阐释，但是理论，从根本上讲，就是方法的整合，除非陷入不一致，否则你是不能将理论“本身”打发走的。然后我会以一首“理论”(现代狂潮)之前的诗歌来结束本文，当然不是在古老的、未着重引用的理论出现之前，在它已经预先提取精华之前——诗是不会这样做的。

每个人似乎都知道反对理论的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运动开始于他们在读研究生期间。不管他们是谁，他们在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那是这种运动开始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开始于雷蒙德·皮卡德(Raymond Picard)对年轻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恶毒攻击，当时皮卡德写了一本书，题为《新批评还是新骗子？》(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 1965)。在《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的主编文森特·利奇(Vincent Leitch)看来，反理论运动“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2]尼

[1] 译者注：该文章的英文标题“Go after Theory”包含三种内涵，因为after有三个含义：“追踪”“跟随”和“反对”。本译文只能选其一种作为标题。

[2] Vincent Leitch, *Theory Matt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57. 利奇的书首发是在1970年，关于理论的第一篇文章可以追溯到1977年。

古拉斯·罗伊尔(Nicholas Royle)于1984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他在1981年的会议论文《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终结》(“Poststructuralism: The End of Theory”)令人记忆犹新。^[3]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场运动可能开始于前弗洛伊德学派研究者弗雷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的《维尼的困惑》(The Pooh Perplex, 1963),或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的《反对解构主义》(Against Deconstruction, 1989),或前拉康派学者迈克尔·博尔奇-雅各布森(Mikkel Borch-Jacobsen)在20世纪90年代对拉康和弗洛伊德的批评。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给人留下的印象是,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刊物[分别在1971年和1974年创刊的《辨析批评》(Diacritics)和《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扼杀了理论的价值:“当我在80年代初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文学研究已经被新政治化了……整套的术语——知识、引用的事实、模仿——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消失了。”^[4]也许反理论确实始于前解构主义者,沃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1982年与人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

前 理 论

人们并不总是记得,像其他几个人一样,迈克尔斯在从事反理论研究之前就是一位理论家。他是创立于1977年的杂志《雕文》(Glyph)的编委会成员,这本杂志是美国第一本追寻德里达方向的期刊,迈克尔斯在该期刊第一期发表了题为《〈瓦尔登湖〉的假湖底》(“Walden’s False Bottoms”)的一篇具有解构主义性质的文章。大卫·辛普森(David Simpson)的那本兼具思想性和学术性的著作《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理论的反叛》(Romanticism, Nationalism, and the Revolt Against Theory)则将反理论运动追溯回到18世纪、英式的基因密码。事实上,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后理论,正是因为我们一直是反理论的。也许我这篇论文的题目应该是“理论及其他者”(Theory and Its Other);但是我更喜欢我现在所使用的标题,因为它本身的解构复杂性捕捉到了简单的真理:在理论之后到来的是在追踪它,既要追赶上它,又要锁定它。“Apprehend”^[5]是另一个拥有两个完全对仗含义的英语单词:理解理论就是监禁它。虽然并不需要对之感到忧心忡忡(apprehensive),但理论总是超出理解的范围。

正如我在文章开始所列的名单所显示的,前理论家往往是最坚持追求理论的人。斯

[3] Nicholas Royle, “Déjà vu”, in Martin McQuillan et al. eds.,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 <http://cw.routledge.com/textbooks/9781405859141/royle_bio.pdf>, 查询于2016年1月1日。

[4] Rita Felski, *Uses of Literature*, Malden: Blackwell, 2008, pp. 79, 81.

[5] 译者注: apprehend 有两个含义,一个“理解”,另一个是“拘禁”。

坦利·费什 (Stanley Fish) 可能是其中最坚持不懈的一个。他以读者反应理论而闻名于世。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是一种奇妙的理论，因为它是一种包含一切的理论。在最初发表于 1981 年的一篇文章（后收录到 1989 年出版的《顺其自然而为之》中）说到沃尔夫冈·伊瑟尔 (Wolfgang Iser) 时，费什确实原话是这样说的。^[6] 读者反应批评可以是关于读者对文本的反应，这可在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The Implied Reader) 中见出，也可能是阅读文本的经验，这可在费什的《为邪恶所惊讶》(Surprised by Sin) 中见出，或者是汉斯·罗伯特·姚斯 (Hans Robert Jauss) 的接受研究中的实证读者，或者是现实读者群谱，这可在诺曼·霍兰德 (Norman Holland) 的《五种读者阅读》(5 Readers Reading) 中见出，或读者的心理，这可在霍兰德的早期作品《文学反应动力学》(Dynamics of Literary Response) 中见出。当然，所有这些，几十年前就已经在 I. A. 理查兹 (I. A. Richards) 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中被揭示。正如理查兹以罕见的机智所展示的，真正的读者读得很糟糕。但是我们可以忘记理查兹所说过的话，因为所有这些后来的批评者似乎都已经这么做了，或至少是大致这样做的。^[7]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变化多端的读者。我们所针对的读者，我们构建的读者，我们得到的读者，我们看到的读者，我们感觉到的读者，近乎应有尽有！问题是，读者变得如此多变，以至于理论失去了它的方位。对于后期伊瑟尔而言，它成为田园生活般的游戏。对于费什而言，虽然他讨厌承认，但是它成为……解构。^[8] 他在 1967 年发表了《为邪恶所惊讶》之后，又在 1972 年发表了《自我消费的工艺品》(Self-Consuming Artifacts)。这里开始了一种前理论家的理论。这本书有 432 页，就在书的中间处——432 页中的 216 页，费什开始了“放手：赫伯特诗歌中的自我的辩证法” (“Letting Go: The Dialectic of the Self in Herbert's Poetry”) 这一章节。“放手”，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短语——释放和放弃，激励的同时解压缩。所以它现在如此，过去亦如此。1972 年，当这本书出版时，赫伯特的诗歌被认为是“决定性地不确定”。^[9] 在关于赫伯特的章节（第 157—158 页）的开篇，费什以他特有的形

[6] Stanley Fish, "Why No One's Afraid of Wolfgang Iser", in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8-86.

[7] 费什曾经不屑地讨论过理查兹的观点，参见 Stanley Fish, *Self-Consuming Artifacts: The Experience of Seven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 411-415.

[8] 费什与德里达被共同列入反基础主义批评者的名单之中。比如 “Why No One's Afraid of Wolfgang Iser” (5 个名字), “Anti-Foundationalism” (23 个名字),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3 个名字)。来自 M. H. Abrams, 见 Stanley Fish,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8, 345;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05. 但他所找到的相关性是大体的，差异性较多也很具体。关于德里达的观点，见本文脚注 89。

[9] Stanley Fish, *Self-Consuming Artifacts: The Experience of Seven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216.

式,确实放飞了理论。他说,赫伯特的“张力诗学”建立了“解决的与消融的洞察力”。^[10]事实上,在费什看来,赫伯特的诗歌所创造的这种洞察力具有“无情的压力”。你可能会感到困惑的是,所解决的为什么可以是无情的——一种放手是一种不放手——但就是这样它进入了前理论世界。费什将赫尔伯特的洞察称作是一种辩证法,虽然这是一种奇怪的辩证法,其中解决方法不是综合的,而是零散的。在费什看来,赫伯特的诗歌由三种消解构成:知觉框架的消解、自我的消解和诗歌的消解。因而它们产生了一种洞见,“使话语模式和知道他们自己那些是例子则变得多余”。而且,为了避免你在所有这些前理论游戏中错过了这一点,他在这一章节介绍的总结中重申:“阅读赫伯特的诗是感受所有东西区别的解体。”^[11]保罗·德曼(Paul de Man)和他的门徒们可能已经对这种不可否认的不可读性经典寓言的陈述感到好笑。对于早先的费什而言,阅读《失乐园》在理论上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在那首诗中,读者学会了做出区分。但是在前理论世界,这一情况则不复存在。现在你不是在学习,你只是“体验”。《失乐园》的读者也在体验诗,但他们不会就此停止:在这首诗中“结果是指令,而指令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读者被要求观察、分析,并放置他的经验。”^[12]但对于已陷入脆弱的、不具备理论化的解构主义中的前理论家而言,经验是无止境的,根据定义,他没有确定的内容。它只是继续走,继续放手。

这就是当你开始前理论运动时所发生的情况。然而《自我消费的工艺品》并非此类作品的最后一部。费什继续出版了一部篇幅较长的著作,讨论赫伯特诗歌中所被忽略的内容,该书的名字是《活生生的寺院》(*The Living Temple*)。在该书最后的章节,标题很响亮,“寺庙之谜的谜底”。在那一章的开首这样说道,“一个新的解释,像任何其他理论……”^[13]这句带有费什风格的话语悄无声息地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从什么时候开始解释也变成了理论?我们不是在这里放弃理论吗?如果一个理论只不过是你的阅读或我的阅读,那么它是没有躯干的。它像蛇一样柔软而狡猾。这句话接下来是这样的:“像任何其他理论一样,新的解释与先前的解释相比,至少应该有两个优点:它应该更简单……并且应该提供更多解释。”所谓“更简单”,费什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这种解释应该具有更高的优雅。理论是美学的对象。像诗一样,它们是解释本身,而不是解释的结构;是建筑物本身,不是建筑的框架;或者最后用费什的终结术语来说,没有基础的结构。这本书的结论简短但切中要害。费什想让它听起来令人惊讶,甚至有些(前)解

[10] Ibid., p. 157.

[11] Ibid., p. 158.

[12] Stanley Fish, *Surprised by Sin: The Reader in Paradise Lost*, 2n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1.

[13] Stanley Fish, *The Living Temple: George Herbert and Catechiz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137.

构的意味，所以他称之为“一种结论，在其中看似任何事物都会被收回”。在文中他指出，理论只是文学史的名字而已，解释只是跟着来的直觉。示范的另一个名字是说服。这就是他从那以来一直演奏的曲调。在《顺其自然而为之》中，有一篇文章篇名为《反基础主义，理论希望，创作教学》（“Anti-Foundationalism, Theory Hope, and the Teaching of Composition”）。对于弥尔顿主义者而言，当然，希望是神学的“不可见物质”。理论是知识的基础。费什所说的反基础主义是指那些认为只有实践真正重要的理论。他说，“一种理论形式根本不是理论。”^[14] 这正是那些追随理论的前理论家的情况。他们希望一种理论不是单一的，然后他们构建他们的希望，将其假装成别的东西的理论。

费什可能是最公开承认反理论就是追踪理论的人。反对某种理论实际上是假设你所反对的理论；反理论一般是提供一种与理论相反的理论；无理论是希望一种隐藏实践本质的简单阅读。所以他在 1998 年平装版《为邪恶所惊讶》的前言中这样谈论读者反应阐释论：“虽然《为邪恶所惊讶》并不包含这种理论的意义的引用，但是它是理论的结果。”^[15] 一种公开的关于罪责的忏悔铺平了通往天堂的道路。不仅仅是费什如此坦诚，下面一段来自理查德·斯特里尔（Richard Strier）在五年后出版的关于赫伯特的阅读的介绍：“这本书中的历史主题要令人信服，必须取决于我是否将诗歌的不可捉摸的地方理解清楚。阅读提供了主要的（尽管不是排他性的）主题证据，而主题指导这阅读。”^[16] 斯特里尔用主题这一词汇，而非理论，但是这两个术语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异的空间。其涉及面是相同的。主题或理论指导阅读；阅读证实了引导我们的理论。“一个人只能读他已经阅读过的。”^[17] 我们总是在理论之后，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寻找什么，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任何东西。

反 理 论

当然，还有其他种类的批评者，他们不是前理论家，而是从一开始就反理论的。他们是那种渴望在前理论到来的批评者，希望废除甚至忘记理论，忘记所有这些新奇的理论之类的东西。他们希望我们回到美好的旧日时光，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阅读。这一流

- [14] Stanley Fish,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2.
- [15] Stanley Fish, *Surprised by Sin: The Reader in Paradise Lost*, 2n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
- [16] Richard Strier, *Love Known: Theology and Experience in George Herbert's Poe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xi.
- [17] Stanley Fish, *The Living Temple: George Herbert and Catechiz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172.

派的圣经是达芙妮·帕泰(Daphne Patai)和威尔·克拉尔(Will H. Corral)于2005年编辑的文集《理论的帝国：异见者文选》(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该文选的导言部分中，第一段就声称，“理论化……看起来更像是指向一个死胡同了。”^[18]带着一贯的、偏执的语调，编辑者认为理论与理论家缺乏“必要的哲学基础”，然后，对于逻辑与一致性的态度依次是：模棱两可的、武断的、荒谬的、怪诞的、可笑的、复杂得难以理解的、浮夸的、可被预测到的、啰唆的、派生的、无尽的重复、多余的、不宽容的、矫饰的、压抑的、疏远的、怪诞的（再一次）、政治狂热的、投机主义的和（以防你已经错过了重点）相当漠不关心的：矛盾、任意、荒谬、奇异、荒谬、不可读的复杂、夸张、可预测、憎恨、假装、镇压、异化、奇异（再次使用）、充满政治热情、不安、机会主义和（免得你错过了这一点）对逻辑和一致性非常漠不关心。这只是导言的部分观点。在“理论”的副标题中，索引中提供了以下内容：优胜主义、坏理论、从内开始的毁灭、恶化、如帝国主义者、如智力殖民者、不容忍、说行话、缺乏对文学的重视、机会主义、政治议程、拒绝进步的想法。^[19]在编辑所处于的研究生阶段，社会学理论是“崭新且令人兴奋的”，对于那些易受影响的年轻学者有着明显的吸引力。但是这一切都变得十分糟糕，因为受到了“政治正确性”和“加速的后现代主义措辞”的影响，导向了一种“始终反对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20]只要我们能够躲到这个恶魔的身后，那么在这些编辑还是学生的时候，或在那之前，这些事物多么良善体面啊！他们也许被认为具有此类的暗指，但是实际上他们否认任何具有退步倾向的复古情怀：“我们的

[18] Daphne Patai and Will H. Corral eds., *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

[19] Valentine Cunningham, *Reading After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02. 坎宁汉姆在开始的时候睁大眼睛看着：“阅读永远是在理论之后。我们每个人，作为读者，在理论的背后追踪，要么是这种理论，要么是另一种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始终都是，在理论后的，后理论家”（第3页）。但后来，经过了四章越发不情愿的赞美之后，他宣称，“理论家们，作为一个阶级，是糟糕的读者”（第59页）。而他所说的“糟糕”的意思是指他们的工作，除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以外，“总的来说是骇人听闻的胡说八道”（第99页），“卑劣低级”（第109页），“虚张声势”和“废话连篇”和“恬不知耻的堕落”（第117页），甚至是“低级无聊”（dinkification）（第128页）。他确实举出了一些很好的例子，但是这些例证的精彩程度都不如他对斯坦利·费什格言的反拨：“轶事的复数体并不是事实”（第73页）。在讨论I. A. 理查兹的《实用批评》中，他将理查兹的九大“批评难点”减少到五种“主要概念”，好像只有理论家容易出现第一种困难，不能够“生成浅显的意义”。参见 Valentine Cunningham, *Pract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 (《实用批评：文学判断的研究》),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4, pp. 14, 12.

[20] Daphne Patai and Will H. Corral eds., *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7. 另一个“变味”的故事版本出现在凯瑟琳·博格斯(Catherine Burgass)的作品中，见 Catherine Burgass, *Challenging Theory*, Aldershot: Ashgate, 1999。博格斯所用的标题双关语；她挑战理论，但是没有觉得其有挑战性。相反，在各种实例，它只是书中一页而已——“像更传统的形式主义一样公式化”，“容易出现方法论不一致，和简单无知的问题”，也容易出现“鼓励对深度知识的肤浅和态度上的不严肃”（第105页）。然而，书中的始作俑者是跨学科，而不是理论本身。

书不是要回归到一个理想的过去（无论如何，这种过去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的介绍仍然将“现在所谓的理论”的“起始”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21]这其中皮卡德-巴特（Picard-Barthes）之间的争论是最早的被确定的反应。^[22]此后不久，他们将反理论写作追溯到“自从上世纪 60 年代晚期又特别强调 80 年代到现在”^[23]这段时间。事实上，此类作品最早可见于 1977 年和 1979 年（M. H. 艾布拉姆斯和韦恩·布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也恰好是当编辑在场的时刻；帕泰在 1977 年获得博士学位，克拉尔最早的出版物，我能够追溯到 1979 年。当然，没有黄金时代。反理论由来已久，因此有理论可以反对。也许从来没有一个时间是没有理论家或不受“他们的高度争执的前提”和他们的“标准辩论”影响的时候。^[24]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也认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现代过，从来没有文化丰富过，也从来没有优于大自然。同样，我们古代过，天真烂漫过，或没有建构过。冲动和系统、直觉和调节、人才和培训、个性和社区、天真和感伤——所有这些不同的无理论或理论化的称呼，他们永远不能开解。虽然帕泰和克拉尔将反理论运动推到他们的研究生时代——如其他人所做的一样——他们的介绍事实上也回到鲍里斯·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大约八十多年前”）^[25]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46 年）^[26]。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可能已经回到了牛津英语词典所引用的，首次将“理论化”作为现代意义词汇当动词使用的乔治·英尼斯（George Innes）：他曾在一篇叫作《军事基本原理》（*Military Rudiment*）、题词为“献给亲爱的读者”的短篇中，声称“没有东西能比实践更让理论如此好理解”。反理论已经从开始就跟随在我们身旁，并没有做出任何看得见的进展。

无 理 论

可能有一种不用理论的批评家存在吗？可能有一位只从事阅读的批评家存在吗？有没有只靠实践就可以更好完成批评任务的？如果这样，为什么总有像英尼斯写的那样的论著文章，在控诉和反对理论？不管怎样，没有阅读是绝对幼稚的。首先，你必须知道一门语言。除非你能数到 14，否则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能力读懂十四行诗的读者。甚至帕泰-克拉尔选集中的一位反理论家，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也承认，“一

[21] Daphne Patai and Will H. Corral eds., *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

[22] Ibid.

[23] Ibid., p. 3.

[24] Ibid., p. 7.

[25] Ibid., p. 10.

[26] Ibid., p. 4.